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關於斷絕和民族主義：回應賀照田教授的回應

About Severance and Nationalism: A Reply to He Zhao-Tian's Response

doi:10.6752/JCS.200809\_(7).0009

文化研究, (7), 2008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7), 2008

作者/Author：高橋哲哉(Takahashi Tetsuya);孫軍悅(Jun-Yue Sun)

頁數/Page：199-20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9\\_\(7\).0009](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9_(7).0009)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思想論壇

《文化研究》第七期（2008年秋季）：199-207

### 關於斷絕和民族主義：回應賀照田教授的回應

#### About Severance and Nationalism: A Reply to He Zhao-Tian's Response

高橋哲哉

TAKAHASHI Tetsuya

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孫軍悅 翻譯

Jun-Yue Sun

首先，我衷心感謝賀照田教授不辭辛勞，為我不成熟的發言寫下了這樣一篇內容充實的回應。

賀教授的回應，與其說是針對我的演講內容的直接反應，毋寧說是針對我作為一個亞洲知識分子的立場本身的疑問。首先我不得不坦白說，很遺憾，現在的我還沒有作好充分的準備，對賀教授提出的疑問作出相應的回答。

其實我原本只不過是一個西方哲學研究者而已。在90年代真正開始介入日本和東亞之間的歷史認識論爭的時候，和歷史學以及國際政治學的研究者們不同，對於東亞的現代史和各種政治問題並沒有專業知識。我只是嘗試著就所謂「戰後責任」這種思考方式進行了一些哲學性的考察，結果便「赤手空拳」地被拋入了與二十世紀整個東亞史相關的歷史認識論爭中。儘管我並不認為，在討論歷史認識的時候，和研究歷史的人相比，研究哲學僅僅是一個不利因素，但我個人在和歷史家或政治學者、區域研究的專家們一起談論東亞的近現代時，是始終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性的。這一點我想事先作一個說明。

下面便是我對賀教授的提問所作出的或許還不夠充分的回答。

一、在我已有的和東亞知識分子的交流中，我的收穫是什麼？碰到的問題是什麼？我覺得怎樣才能克服這些問題？

在和韓國、中國大陸、台灣等東亞知識分子的交流中，始終讓我覺得很奇怪的是，和「戰前」相比，「戰後」的日本和其他東亞地區的人們之間的斷絕似乎更為深刻。在「戰後」的日本人當中無須說明的「戰前」和「戰後」的用語，在其他東亞地區卻並非理所當然，這個事實本身也體現了兩者之間的斷絕。

為什麼我說覺得「奇怪」呢？因為在日本，所謂「戰前」是指帝國日本作為侵略者和東亞地區的人們相敵對的時代，而「戰後」是指民主化了的日本在《和平憲法》之下專注於經濟建設獲得成功的時代。如果是這樣的話，原本在互相敵對的「戰前」，斷絕應該更為深刻，然而在和東亞研究者的交流中，根據我的親身體會，毋寧說在日本停止侵略成為「和平國家」的「戰後」，和東亞地區之間的斷絕反而更加深刻。但隨著和東亞學者之間的交流愈來愈深入，我開始理解，其實這並不是一個「奇怪」的現象。

在交流中我逐漸意識到，儘管1945年8月15日是帝國日本的臨終之日，在朝鮮半島、台灣是擺脫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解放之日，但無論對日本人來說，還是對東亞的人們來說，那一天卻並不是從「戰爭」（乃至「戰前」）到「戰後」的最後一個轉捩點。在日本人的意識裡，從那一天起，日本從戰爭的時代進入了「和平」的時代，然而這種意識卻正反映了「戰後」變得內向的日本人對同時代的東亞毫不關心的態度。

「戰後」的日本人很快就忘卻了不久以前自己作為統治者而「君臨」的、就在自己眼底的東亞人民（儘管是以一種畸形的形式），在自己的「和平」中自我陶醉地享受起經濟繁榮來。然而在中國、朝鮮半島、台灣，當然也包括越南和菲律賓，冷戰不時轉變為熱戰，軍事政權的鎮壓和對鎮壓的抵抗運動此起彼伏，民眾仍然不斷在犧牲，根本談不上什麼「戰後」。在「和平與繁榮」的名義下，日本人甚至意

識不到自己早已被編織進了冷戰結構，通過《日美安保條約》和在日美軍基地與東亞的戰爭密切相關。

韓國、台灣、中國大陸學者圍繞著戰後冷戰結構帶給各個區域的暴力的創傷進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式的探究，使我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對於像我這樣在「戰後」日本出生成長的日本人來說，爲了和東亞的朋友們加深相互理解，不僅需要瞭解1945年之前的帝國日本爲東亞留下的傷痕，還必須對1945年之後的東亞歷史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如果日本學者要和東亞學者交流、合作、探討共同的課題，那麼正如賀教授正確指出的，不僅去殖民、去帝國主義，去冷戰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爲此日本研究者必須首先從瞭解1945年以後的東亞歷史做起。

二、對於現今日本右翼勢力的崛起，中國大陸應如何應對才更具有建設性的效果呢？

賀教授的提問，是與「中國大陸特別強調甲級戰犯」的局限性的這個問題聯繫在一起的。所謂「甲級戰犯」的問題，恐怕也就是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

首先需要確定的是，中國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批判集中於甲級戰犯的問題，我以爲，作爲中國政府的立場是有充分的合理性的。儘管對於侵略戰爭和軍國主義指導者的責任我們不能妥協，但追求日中和解與友好、不對日本全體國民採取無端敵視的判斷，在政治上可以說是極爲明智的選擇。當然，從實際受到日軍殘害的中國民衆的感情來說，並不那麼容易就被「指導者負有全部責任」的解釋所說服，儘管如此，中國政府卻試圖通過強調這一點來超越「復仇主義」。事實上，在經歷了戰爭時代的日本人當中，確實也有人因爲中國這一立場的崇高道義性，開始正視自己的罪行和責任。儘管在今天的日本，把中國只強調甲級戰犯的批判也視爲「反日」而加以駁斥的輿論愈來愈高漲，不過在我看來，這主要是日本方面的問題，對於中國應對方式的「錯誤」或「局限」，我個人並沒有說三道四的資格。

關於把靖國問題看作「甲級戰犯合祀問題」這一思考的局限性，我是從兩個方面來考慮的。首先是從日本人的歷史認識的觀點，其次

是從日本人的現狀認識的觀點。

從歷史認識的觀點來講，所謂「甲級戰犯」是在東京審判（遠東國際軍事審判）上被指控犯有「破壞和平罪」而被宣判有罪的人，是在法庭上被審判的戰爭、即九一八事變和其後的日本戰爭的責任者。但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已經是包括台灣、朝鮮在內的殖民帝國了。因此，如果僅僅把問題限定於「甲級戰犯」，那麼日軍爲了建立殖民帝國所進行的侵略的歷史就會被排除在外。然而事實上，日本帝國最初的對外戰爭、即1874年出兵台灣時的日軍戰死者、日清戰爭之後武力鎮壓台灣時的日軍戰死者、還有爲了確立和鞏固對台灣、朝鮮等殖民地的統治而投入的日軍戰死者、以及爲鎮壓台灣原住民族而投入的日軍和員警的戰死者，都被作爲護國神和英靈祭祀於靖國神社，彰顯功績。靖國神社的問題必須放在這整個歷史過程中來探究。然而在日本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當中，也存在著對九一八事變之前的殖民統治的責任置之不問的傾向，這「局限」必須予以克服。

所謂現狀認識的觀點，就是在現今日本的政治形勢中，今後靖國神社將發揮什麼樣的功能的問題。憲法9條（放棄戰爭、不保持戰爭力量、不承認交戰權）的改訂在日本早晚會成爲政治問題。如果因憲法9條的修改，自衛隊變成正規軍，新的日本軍被允許在海外行使武力的話，靖國神社將作爲接受新的日軍戰死者的場所而引起人們的關注。在自民黨內有實力的政治家當中，也存在著這樣一種想法——通過把甲級戰犯合祀者從靖國神社分離出去，來堵住中國和韓國的批判，實現首相和天皇參拜的常規化。比如現在的麻生太郎首相就持有這種想法。也就是說，他們想利用靖國神社，爲新日本軍的武力行使奠定基礎，爲此甚至不惜把甲級戰犯移出靖國神社。他們認爲，只有把甲級戰犯排除出靖國神社，靖國神社才能爲他們所利用。

無論是舊日本軍還是新日本軍，爲了支撐日軍的武力行動，靖國神社並不需要甲級戰犯。靖國神社把甲級戰犯加入合祀對象是在1978年，但靖國神社並不是從那時候起才成爲危險的存在的。原本靖國神社裡並沒有甲級戰犯。我以爲，如果把甲級戰犯排除在外，靖國神社反而因此「復活」的話，這才是靖國問題中最危險的走向。

三、現在的日本右翼的社會史基礎是什麼？和丸山眞男所分析的當年的日本右翼社會史條件有沒有歷史上的關連？「太陽旗的懸掛」、「神社參拜」等當今的現象所對應的精神—心理是否仍然和半個世紀以前相同？如果有變化的話，其變化的歷史、現實原因是什麼？

正如賀教授所指出的，丸山所分析的當時的日本民族主義和當今日本的民族主義，其歷史社會基礎因「此後日本五十餘年高度的現代化發展」而發生了相當大的改變。從1945年戰敗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六十多年，經歷了兩代人的歲月。現今日本的20、30歲的年輕人，他們的父母都沒有經歷過戰爭和戰敗。麻生太郎首相今年68歲，連他也只是決定了戰後日本走向的吉田茂首相的孫子，而不是兒子。經過了這麼長的時間，如果日本的民族主義仍然和過去保持著同樣的歷史和社會、精神和心理基礎的話，那才是不可思議的現象。

關於社會史基礎的變化，至少需要思考兩個主要原因。首先要考慮的是從戰後復興到高度經濟成長、再到今天的「現代化」進程。在這過程中，「現代化」最終瓦解了替日本舊民族主義提供了社會基礎的底部的家族、村落、地方小集團，這變化對靖國問題也產生了影響。以往村落共同體或地區共同體被組織在神社周圍，國民作為同一氏族神的子孫被納入「國家神道」體制，而現在支撐著神社的村落／地區共同體已經瓦解。

另一個要因是，東西冷戰終結後，從上世紀90年代起席捲了日本的全球化，尤其是市場原理主義的蔓延造成了日本社會的崩潰。在傳統的村落／地區共同體日益衰退的戰後日本，如果說還有什麼要素可以把國民統合起來的話，那就是以終身雇用為前提的企業／公司的「日本型經營」，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一億總中流」的意識<sup>1</sup>。也就是說，脫離了村落／地區共同體的個人通過成為企業／公司的一員，從

---

1 編按：「一億總中流」（いちおくそうちゅうりゅう，或稱一億總中產），是1960年代在日本出現的一種國民意識，其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尤為凸顯。在終身雇用制下，九成左右的日本國民都自認為中產階級。「消費是美德」、「金滿日本」成為當時的社會風氣。引用自：<http://zh.wikipedia.org/wiki/一億總中流>。

而避免了成為原子化的個人。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衝擊使企業／社會爲了生存而不得不放棄「日本型經營」，於是產生了大量隨時可以解雇的非正式雇用勞動者。現在日本的勞動者中三分之一是苦於不穩定、低收入的非正式雇用勞動者，而在正式雇用勞動者當中，無論如何工作都無法增加收入的所謂「勞動貧困」(working poor)的新的貧困階層也正在日益擴大。現在的日本不但稱不上「一億總中流」，甚至已經成爲了一個貧富差距顯著的「格差社會」，比起一部分被稱爲「贏家」的富裕階層和其他階層之間的隔閡，正式雇用勞動者和非正式雇用勞動者之間的裂縫更難以彌合。在這種情況下，個人不但沒有被統合於傳統的共同體，甚至也沒有被統合於企業／公司，而成了一盤散沙式的個人。

這就是現代日本民族主義的歷史、社會基礎。在此基礎之上又形成了與此相應的精神－心理。構成當今日本民族主義心理基礎的，正是因現代化和全球經濟的市場原理主義而被分裂成散沙的個人的無可寄託的感情、對於不安定的現實和無法改變這種現實的自己的絕望、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焦躁心理。

2007年1月號的《論座》雜誌刊登了一篇題爲〈想抽「丸山眞男」的耳光——年齡：31歲、職業：不定、希望：戰爭〉（「丸山眞男」をひっぱきたい31歳、フリーター。希望は、戦争）的文章引起了眾多的爭議，作者赤木智弘的觀點就非常具有象徵性。他寫道，在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的日本社會，作爲一個沒有固定職業的打工者（非正式雇用勞動者），只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自己對將來早已絕望，唯一的希望就是戰爭。因爲只有戰爭才能一舉打破現在的格差社會中所存在的不平等的秩序，粉碎正式雇用勞動者所壟斷的既得權益，使自己這樣的非正規勞動者也能獲得「機會」。對於像自己這樣因收入過少而無法建立家庭，在公司裡沒有地位，作爲一個「落伍者」又無法得到社會承認的人來說，戰爭是作爲「日軍士兵」直接和國家相關連，作爲國家的一名成員獲得承認的最後機會，即便戰死也可以作爲英靈被祭祀於靖國神社。這種想法典型地體現了掙扎在格差社會底層的勞動者通過發現自己是一個「日本人」，共有民族感情，從而在心

理上一舉獲得拯救的過程。在家庭、地區、公司、社會中都無法找到自己位置的散沙般的個人，僅僅因為自己是一個「日本人」而在心理上被統合於日本這個民族——我以為，當今日本的民族主義正是以這機制為基礎的。

那麼，對於今後將日益增多的這種現代日本的民族主義者來說，日本民族主義的根據又是什麼呢？我們發現，無論是右派還是左派，戰後日本的政治勢力或政治思想沒有為日本民族主義創造出任何新的依據。在日本，提起民族主義依然是「靖國神社」、「日章旗、君之代」<sup>2</sup>和「天皇」。這些殘留至今的舊帝國的遺產在戰敗後的民主化過程中並沒有得到清算。為什麼這些帝國的遺產一直陰魂不散沒有被清算呢？我以為，這個問題的核心就在於昭和天皇在戰敗後仍舊居於天皇的地位這個事實。關於這個事實的含意，我已在演講中作了說明。無論如何，當今日本的民族主義者們除了再次利用「靖國神社」、「日章旗、君之代」、「天皇」等帝國的遺產之外，並沒有其他可作為民族主義根據的東西。反過來說，我們不能因為這些根據沒有變化，就以為現代的民族主義的社會基礎或心理基礎和戰前、戰時是相同的。

四、「日本戰後的批判性思潮與運動的努力之所以成就不夠理想，是因為日本戰後無論是左翼還是自由派知識分子都比較忽視民族主義、民眾感情的問題。所以今後日本的批判知識分子必須調整自己的批判和介入方式，正視民眾情感和民族主義問題。」對於這觀點，我是如何看待的？

這種看法在「日本的知識分子」中間的確存在。問題主要在於，所謂「重視」或「正視」「民族主義和民眾感情的問題」這個說法到底是什麼含意？據我所知，這種觀點多半包含了以下內容：「戰後日本，左翼和自由派從反省戰前、戰時的極端國家主義出發，由於過分批判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反而使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成為了右翼或

---

2 編按：日章旗指日本國旗，君之代指日本國歌。



保守派的專利。既然民眾擁有樸素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感情，那麼左翼和自由派如果對健全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不採取肯定的態度就無法得到民眾的支持」。

就我個人而言，對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patriotism)，我並非一概否定和排斥，因為我認為，既然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是歷史現象，那麼就需要把各種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放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中來評價。例如，一般人們都把近代民族主義的起源追溯到法國大革命和由此而誕生的法蘭西共和國，法國大革命中的屠殺等負的側面也受到了批判，但作為一場在「自由、平等」的理念下推翻了身分等級制社會的運動，我認為還是值得肯定的。又如，為擺脫殖民統治的運動也訴諸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結果，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以亞洲和非洲為中心，很多民族都從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贏得了獨立。儘管新興國家此後遇到了各種困難，但並不能因此就把民族主義在擺脫殖民統治的解放鬥爭中所起到的作用都否定掉。因此，如果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在戰後日本的歷史語境中也帶有解放的含意的話，我不會簡單地就採取全面否定的態度。

另外，若說戰後日本的左翼和自由派完全無視「民眾的感情和民族主義的問題」，那也不盡然。正如小熊英二氏的《民主與愛國》等研究所顯示的，1950年代的戰後民族主義和左翼的運動在使用「民族」、「民族主義」、「愛國」這些詞語時是肯定其價值的，可以說，當時由於受到亞洲各國民族主義的影響，也存在過戰後日本左翼的民族主義。在戰後初期的日本左翼民族主義中，也殘存著一些未經批判的戰前延續下來的部分，如果當時的民族主義能夠進行自我批判，克服這些負面因素，比如作為打破戰後保守政權的對美追隨路線的解放運動而成長起來的話，或許在歷史上也能夠起到積極的作用。

即使在今天，仍然潛藏著類似的可能性。如果今天日本的「民眾的感情和民族主義」是朝著抵抗美國要求修改憲法9條的壓力，維護憲法9條，並以憲法9條為根據，縮小、撤除沖繩等地的在日美軍基地，以憲法9條為根據把和美國的軍事同盟條約改成和平友好條約，以憲法9條為根據和東亞各國建立和平友好的關係這樣一個方向發展

的話，我一定會舉雙手贊成的。如果不是以靖國神社、日章旗、君之代等舊帝國的遺產，而是以憲法9條為根據，日本民族主義或許也能夠在歷史上發揮積極的作用。反過來說，如果現代日本的「民眾的感情和民族主義」固執於為侵略和殖民統治提供了依據的舊帝國的遺產，帶有對東亞各民族的蔑視感情和排外主義，在和美國的軍事同盟下企圖展開海外軍事行動的話，我一定會反對到底。

最後，我想簡單地作一下整理。我認為，在近代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中包含了對實現國民內部平等的要求。儘管近代民族國家在「人生來就是自由平等」的口號下，實際上卻把「人」的範圍局限於「國民」，而且「國民」內部仍然存在著以性、階級、出身民族等為由的種種歧視；但這些歧視正在逐漸被廢除，也是因為「國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近代民族國家的理念，民族主義裡包含了在國民內部實現平等的要求。直至今今天，對平等的要求仍然需要堅持下去。今天，日本貧富差距的加大使各階層國民之間相互隔絕，在掙扎於貧窮線上的階層中甚至出現了期待戰爭和排外性的民族主義的呼聲，並且愈來愈高漲，在這種情勢下，民族主義中所包含的要求實現民族內部平等的部分正是我們需要重新考慮的問題。

所謂民族主義的問題，也就是說，這種民族內部的平等要求帶有意向歧視和敵對民族外部、他者轉化的傾向。如果民族主義是在民族的內部和外部劃分界線，保護內部、敵對外部的運動，那麼轉化似乎就無法避免。然而對平等的要求是否必然會轉化為歧視和敵對呢？近代西方的民族國家和帝國時期的日本國家表面上以國民內部的平等為原則，實際上卻歧視殖民地的異民族、向敵對民族不斷發動戰爭。如果還有我願意支持的民族主義運動，那就是在堅持國民內部的平等要求的同時，在和其他民族的關係上，也同樣堅持要求徹底平等的民族主義。然而這樣的民族主義，究竟有沒有存在的可能呢？

以上，我從賀教授的提問中提煉出了四個核心問題，並嘗試著對此作出了回應。還有一些相關問題沒有回答，因為篇幅有限，只能就此擱筆。我衷心期待著能有機會和賀教授再次展開對話。